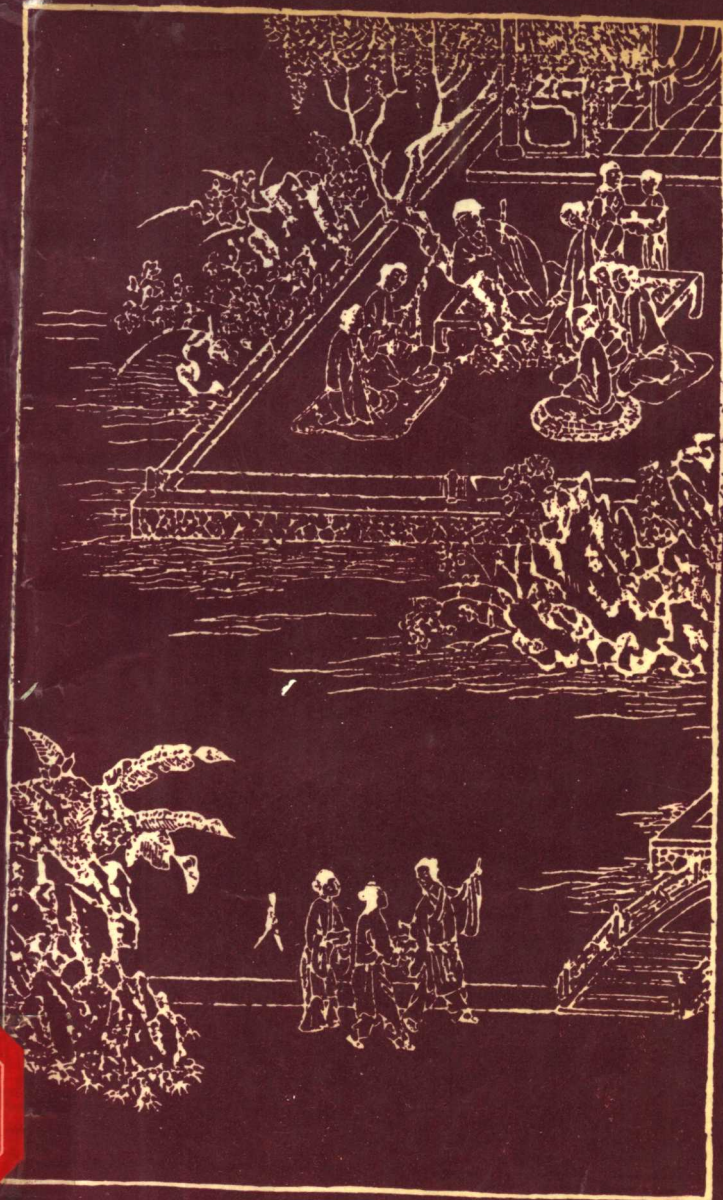


金瓶梅新論



李时人著
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题签:何满子

封面设计:麦荣邦

《金瓶梅》新论

李时人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6.75 插页 1 字数 161,000

1991 年 8 月第 1 版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1



• 229

定价 3.55 元

序 言

何 满 子

《金瓶梅》在明末已被列为“四大奇书”之一，这很简单，在当时已经问世的长篇小说之中，它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清初人又把《金瓶梅》标举为“第一奇书”，这就不管你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是和书中放肆的性描写有很大关系了。性问题不仅是研究《金瓶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是拦在你面前必须先将它制服的一个问题，否则你就过不去。

指斥《金瓶梅》是“淫书”，应该说是师出有名的，虽然这个评价未免太皮相了一点；我以为，与其说它是“淫书”，无宁说它是“愤书”。金圣叹评《水浒》，曾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金批本《楔子》评）。《水浒》作者的“何等冤苦”很容易解答，他发泄着封建暴政下平民的冤苦。逼上梁山的现实及其意义，读者、作者都是很明白的。《金瓶梅》所发泄的冤苦，依我看来，连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或未必完全清楚。这是须如本书作者时人同志所说，“站在新的时代文化高度观照《金瓶梅》”，才能发现其奥蕴的。

晚明的呼唤人性解放的思潮，以及上层统治者纵欲的“颓风渐及士林，……世间乃渐不以纵谈国帙方药之事为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当然是《金瓶梅》敢于和乐于渲染性关系的原因，但这些意识振荡和生活风习的感染，只是提供一种气候，而不是怨愤之所因的本源。这个本源包括《金瓶梅》作者在内的当时人是没法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现象，从现象中直感到某种不对头的历史运动的窒塞和困恼，凭着敏感将这种历史苦恼从刻画人生现象中宣泄出来。

愤在什么地方？小说中西门庆一家的生活是变态的生活，变态的人性——不，别的都是常态的，只在生命最敏感的动物性的疯狂取乐上是变态的。这是一种摧毁生命的取乐，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话，是“作死”。

这是一种生命无法找到正规的道路发挥其精力的自暴自弃。

正如不少研究者所论定的，西门庆虽有多重社会身分，但他真正的角色是商人。在商品经济中，马克思一再论证，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西门庆不能不是商业资本的肉身的代表。而且，在封建制度的明代，要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不可能没有经商以外的另外的社会身分，没有官僚、恶霸的身分和暴发户的特点，这个代表就不典型。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崛起，即原始积累的时期，有一个不能排除的特点，就是掠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家主要依赖海外掠夺，夺的是殖民地的财富，心安而理得；中国虽然也有“发洋财”的海外贸易，但规模极小，不成气候；主要是向社会内部的各色人等那里巧取豪夺，夺的是左邻右舍；深夜扪心，大概不会心安理得，贪欲难遏而庆幸于掠夺得手之后，潜意识中是有愧疚感的。豪富者作佛事，做慈善事业出些钱，其中就包含着隐约的赎罪感，不仅是费财消灾或为子孙修福。

商业资本的历史出路是转入生产，使之无穷地增殖，这便是西

方近代工业社会得以兴起的经济规律。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正是商业资本没有实现合于历史规律的转移。这个道理，当时的商业资本拥有者是不能认知的，他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未能遂行历史使命的怅憾。但有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钱得不到正当的使用，是要害人的，首先遭殃的常是钱的主人。“多财货则恣欲”是最便捷最易滑入的致害之路，如果钱的不获正当使用正好和某种历史运动的因果相联系，那末，钱的主人或被钱所害就带有了悲剧的性质，至少在客观上，他是历史运动的轨道挣扎下的牺牲者。他“多财货而恣欲”的自暴自弃，就成为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资本及其肉身的代表的自暴自弃——西门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悲剧象征。

当钱不能获得正当运用，既然会产生罪恶的效应，那么表现在人生现象中也必然是丑恶的。因此，《金瓶梅》的性生活的秽褻描写便是对历史的忠实；倘若把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写得十分高雅，十分含蓄，就不但有背于人物性格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就没有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了。因此，哪怕小说对丑陋的性描写多少带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态度，乃至不无欣赏的态度，泄露了作者鄙俗情操的一面，也只能算是细枝末节；何况还有因为晚明世风的大气候和冲激理学性禁锢的不应苛责的理由呢。

因此，《金瓶梅》所描写的商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的自暴自弃，是对历史无可奈何的苦恼所激发的泄愤，戕贱自身的生命以泄愤。

而且，你难道嗅不出这个毁灭了的商人对世人的负疚感么？

用什么可以证明《金瓶梅》不可能是历史积累型的小说？因为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生现象的历史涵义，不能早于这个历史时期所发现，所表述，只能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写照。这个证据比所有从文献中选剔附会的理由要硬得多。

这样一种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人生现象，在美学转化中不比

较细致地刻画出人性，用《西游记》以前几种历史积累型小说那样的粗线条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金瓶梅》将以往小说广袤的空间跨度缩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小城市的范围，以便拉近焦距，给人物性格的细微描绘以用武之地，以深度幅射广度，为后来的小说，特别是《红楼梦》创造了范例。

《金瓶梅》一出世，就受到了当时思想较开明的文人的赞赏，可想而知也遭到了一些卫道者的诅咒。但不论物议如何，它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之大却是空前的。中国小说从小说史的第一页唐人传奇起，就以绘写现实人生为目的，短篇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都有这个传统，但长篇小说却截至《西游记》止，都以历史和神魔题材间接地或曲折地评价人生，《金瓶梅》开创了以长篇小说描绘现实人生的新纪元，把小说引上了与现实密接的干预人生的正规道路，这里小说艺术本该承担的第一义的任务。这一倾向以后就成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主流。《金瓶梅》的表现方法和技法也给了后来的小说作家以多方面的启发，别的不说，单讲将方言引入人物对话以添加人物的生活气息和形象的真实感这点来说，就为后来不少小说所承袭，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都摒弃了早先小说对话所用的书面语言，以至后来竟有了方言小说这么一支。而在《金瓶梅》以前，只有《水浒传》在少数人物如鲁智深的对话中偶而一用，《西游记》也大抵只是在人物引用俗谚时使用方言，并且前此的小说中，人物对话和作者的叙述语言也没有《金瓶梅》那样的吻合和融洽。

《金瓶梅》还卷起了一股摹拟的和蹶踪的旋风，这也是中国小说史上极堪注目的现象。其他几部成功的小说虽也有续作和模拟之作，如《水浒》有《后水浒》、《荡寇志》，《西游》有《后西游》、《续西游》之类，《红楼梦》续书最多，也不过十多种。而《金瓶梅》则引出几乎绵延了一百年的系列才子佳人小说，这些书不仅以主人公的名字缀合成书名，看得出是摹效《金瓶梅》的故智，而且分明是《金瓶

梅》反理学禁锢意识的反动或调和。这类被称为言情小说的作品，虽然也主张男女择配自由，但归根结底是遵循礼教，删《郑》《卫》而续《周南》，不敢越名教一步的。婚外恋和再醮为这些小说所避忌，至于性描写则更视为蛇蝎，完全是把《金瓶梅》当作一个敌对的参照系而落笔的。这现象就足以证明《金瓶梅》的影响之深巨。另一方面则有相当数量没有《金瓶梅》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丰富内容而徒然渲染性行为的劣作，呈示着《金瓶梅》的负面的影响。

还有，较为聪明的作家则从结构生发上取法于《金瓶梅》的机轴，董说的《西游补》即是。《金瓶梅》取《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横生枝节，楔入其间加以展开，化附庸为大国，生发出了一百回大书；《西游补》也取孙行者故事，从“三调芭蕉扇”之后，由取经路上别出“青青世界”，构成一部别有情致的小说，杼机如一。

如此重要的一部小说，理应广泛深入地进行研究，但可惜研究《金瓶梅》比研究别的小说多一层困难。这是因为，研究小说从来就是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共同的事业，研究者必须从读者的美感体验的反馈中取得参照信息，有时还必须以读者的美感体验来验证自己的论证。《金瓶梅》虽然历来为文人所激赏，但读者的范围不广，而且也确实不宜普及，尤其在中国这样有长期性禁锢传统的社会心态的条件下，传播更须谨慎，这是无须论证的。事实是，《金瓶梅》名气大而读者不多，研究只局限在学者圈子中。鲁迅曾说“**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与名言》），这话实在精辟而意味深长，《金瓶梅》的研究现象也证明专门家常多悖论，光是作者是谁的考证中，悖于事理的议论就颇不少，其他方面自可推知。

时人同志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金瓶梅》的研究论文，有的与鄙见暗合，有的则是我所未尝留意或未尝发现的。他从晚明文化的全景着眼，议论《金瓶梅》的作者、创作过程和传播情况、历史内涵、艺术方法的各个层面，有不少不失为一家之言的创见，也提供了不

少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都不是泛泛之谈和人云亦云之见。现在结集出版，我想定能有裨于《金瓶梅》乃至古代小说的研究，并能使小说读者获得理解和启发。我本人对《金瓶梅》缺乏研究，从来不敢轻率议论，因欣慰时人此书的出版，故敢就以往阅读所得印象，作如上的泛肤之谈，用以为学术界获得这一新成果庆。

1991年4月于上海市西迎曦楼

目 录

序 言	何满子(1)
-----------	--------

代前言: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 ...	(1)
----------------------------	-----

《金瓶梅》:中国 16 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6)
-----------------------------	-----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	(25)
------------------	------

《金瓶梅》人物论(八篇)	(54)
--------------------	------

西门庆	(54)
-----------	------

潘金莲	(60)
-----------	------

李瓶儿	(67)
-----------	------

庞春梅	(75)
-----------	------

吴月娘	(80)
-----------	------

应伯爵	(84)
-----------	------

孟玉楼	(89)
-----------	------

朱惠莲	(94)
-----------	------

《金瓶梅》的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	(99)
------------------------	------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与徐朔方先生商榷	(107)
附：“词话”新证	(120)
谈《金瓶梅》的初刻本	(133)
《谈〈金瓶梅〉的初刻本》补证	(140)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	(144)
关于“兰陵笑笑生”	(147)
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	
——兼谈我们考证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173)
《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	(196)
后 记	(204)

代前言：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 《金瓶梅》

《金瓶梅》问世 400 年来，可以说出现过两次“《金瓶梅》热”，一次是其刚问世的晚明时代（清初是其延续），一次就是最近几年。最近几年的“《金瓶梅》热”（吴晓铃语），是一个值得思考，也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丹纳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从创作和接受的两极来说，《金瓶梅》产生于晚明（至少在嘉靖以后），并引起当时传抄、阅读、出版之热，都与晚明（至少是局部地区）的文化背景（商业发展、城市风貌改观，社会心理之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社会思潮、文学潮流）有关。清人入关以后，《金瓶梅》的日趋沉寂，不光是统治者禁锢的问题，也与社会传统经济秩序的恢复，理学的重倡，以及文学中理性主义、古典主义重占主流有关。读者失去了和作品的心理对应，自然“热”不起来。今天的“《金瓶梅》热”不光表现在出版和阅读热，重要表现在研究热，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是否与时代文化的某些方面（诸如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社会

心理的某些变化以及思想的相对开放)有关,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金瓶梅》在旧时虽被列为禁书,也有人千方百计寻来看,那也是出于另外的一些心理)。

关于《金瓶梅》,现在是众说纷纭。过去有“说不尽的《红楼梦》”,现在也可以说“说不尽的《金瓶梅》”了。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人类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作者——文本——读者”这一完整过程完成的。好像是罗曼·罗兰说过:没有人读书,人们在书中读的都是人自己。“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思维方法,因而对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莎士比亚也说不尽,鲁迅也说不尽。何况小说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可以说是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产生于晚明的《金瓶梅》本来就是一部中国 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广泛地写到了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心理状态,表现了与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以及对社会、人生、人性的探索以及种种新的审美情趣。因此,我非常赞同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去研究《金瓶梅》。但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有一点大概特别重要,那就是对《金瓶梅》研究我们不应该仅仅再停留在用旧有的研究范式和意识水平去诠释作品,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去观照《金瓶梅》。

所谓“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我想应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上面所说的对采用不同视角和方法的研究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比如把《金瓶梅》当作一个自足的领域,采取文本主义的批评和把《金瓶梅》放在中国小说史的流程中通过类型的确定或通过艺术技巧的演进来评价都是有意义的,甚至通过性意识、性心理的探索来研究《金瓶梅》也是完全可以的。顺便说一句,《金瓶梅》、《肉蒲团》等

作品中的性描写、甚至直接写到的性行为过程，实际上还反映了一些带根本性的、文化深层的问题，比如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异以及人类是如何通过社会的、个人的努力希望弥补这一种不平衡。明乎此，我们可以追究到为什么古今中外作品中的性描写和“色情文学”始终吸引读者的原因，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文明为什么始终表现为恩格斯所说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退步”的规律。

其二，所谓“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也包括文化视野必须广阔的意思。1986年在第二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我曾强调了《金瓶梅》与晚明历史、社会思潮的关系，提出它是晚明文学新潮代表作品之一（《〈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后刊于1987年第5期《文学遗产》杂志）。晚明社会无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些类似的地方，晚明社会思潮与欧洲当时的人文主义也有相通的地方。最近看到一些文章仅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无意地把晚明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相类比，强调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强调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的“新兴”性质。这样一种类比，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不小的偏差。因为14世纪的意大利，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形成了足以和旧世界抗衡的力量，独立的城市为他们的崛起提供了堡垒，与中世纪神学完全对立的人文主义提供给人们的是全套全新的观念。《金瓶梅》产生的16世纪中国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商品经济（表现在流通上）的畸形发展，经济关系没有从根本上为历史质的突破提供充足的条件。明王朝的政治统治虽然呈现颓势，但大一统专制统治仍然以传统的力量制约整个社会。作为晚明社会新思潮，基本上还是作为传统思想的异端存在，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规定性。正是由于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与腐朽的大一统专制制度并存，封建权势与金钱的结合，使晚明陷入一种疯狂、动荡的黑暗，而作为晚明出现的“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西门庆们由于带有孕育他们的母体的恶性基因，必将走向

覆亡，而不可能完成向“第三等级”的转化，因此晚明出现的实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历史演进的历程不同，所以它们在历史进程形态上差异很大，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纵横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来看问题，就免不了产生误差。比如文化背景的问题就直接影响了我们对《金瓶梅》研究中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性描写问题的认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表现为宗教禁欲主义，而中国的禁欲主义则是一种礼教禁欲主义。毫无疑问，不管是宗教禁欲主义，还是礼教禁欲主义，都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压抑，但是从孔孟到程朱，中国的礼教禁欲主义从来没有像宗教禁欲主义那样把人间的一切都宣布为邪恶不净，只承认彼岸世界，而是肯定人间生活的实在性，包容了一些原始人性观念和人道主义因素。这正是中国中世纪禁欲中有纵欲、淫乱和性爱不分的原因，也使解除这种禁欲主义的禁锢要比西方打破宗教禁欲主义的统治困难得多。因为宗教只是外在的枷锁，而礼教却由于长期积淀结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人们心灵的桎梏。所以晚明反对禁欲主义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特殊（极端）的方式进行的，《金瓶梅》对“财色”的描写和晚明许多作品一样，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觉醒，但却以性放纵的丑陋形态出现，不正是受这种历史文化的影响吗？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十日谈》不仅在形态上有所不同，而且其影响也不同。

第三，应该是最重要的，我所说的“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强调一个时代意识的问题。人的本性是对自由的绝对追求，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语）。本来，人类作为整体征服自然，克服自然的奴役，希望获得自由，但人类走出伊甸园，却永远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原始的自然和谐关系，给自己带上了社会的“枷锁”。虽然，恩格斯说文明时代“任何进步同时

也是相对的退步”，这一进程也包括人对自身的禁锢。但是，现代人类文明意识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此对以往历史的一切，我们都应该强调时代意识的观照。再举《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例子，虽然其作者着重“财色”（包括性描写）切入晚明社会生活，从而揭示这个社会的本质特点，是作为小说家无可指责的选择，性描写实际上也是《金瓶梅》有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时代和文化的规定使他的性描写，无论是意识上还是美学方法上，都还停留在那个时代水平上。由于受文化和文学的“传统和惯性”影响，也由于作者感性和理性的错位，不仅使《金瓶梅》的性描写在倾向上表现出二律背反，也使其全书在描写上形成并不一致的笔墨。《金瓶梅》世界里的男女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徒，而只相信肉体的享乐”（雅各布·布克哈特语），当然是对禁欲主义的冲击，我们从潘金莲的人生悲剧（性饥渴——纵欲——灭亡）的历程中，也可以听到人物心灵深处发出的、虽然很微弱却是原始生命力的最本质的呻吟和呼唤，但作品有些地方表现出的只是那个畸变和病态社会的现象。作品中的有些性行为描写也许是必要的，但也有些地方是完全缺乏创造性的因袭或主观扬，厉破坏了作品的美学品格。应该说，《金瓶梅》虽然是中国小说中的煌煌巨著，但是它又是一部非常复杂的作品，其内容的杂驳、倾向的错乱都很惊人，技巧的粗疏幼稚也随处可见。在《金瓶梅》中，创造和因袭、弘大和卑琐、深刻和浅薄、朴实和庸俗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研究者站在时代意识高度去加以观照审视，并因而得到历史的启示。

（本文系1989年6月在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载于《学习与探索》杂志1990年第3期）

《金瓶梅》：中国 16 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引 言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①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支点的晚明社会思潮，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本位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

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社会伦理道德，人的本性是第二义的。从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到韩愈的“道统”，莫不赋予人的本性以某种先验的规定性，宋明“理学”更径直断言人性是“天理”的衍生物。王阳明张扬“心学”，其主旨虽然也在“存天理，去人欲”，企图补救道德纲常的崩溃，但他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则把“天理”看成是心的映象，而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程朱侈谈人性只是“天理”的衍化，完全抹煞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不但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被当作“人欲”为“理”所否定，就连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无情的“理”所吞

^①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 433 页。

噬。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所谓“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并非只是认识论上的感觉、知性，同时还是道德上的“善良意志”。他把封建纲常伦理的规范，由外在超验的“天理”变成内在主观的“良知”，其用意在于说明纲常伦理的可行性，但实际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力量，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本来，到晚明，中国封建文明似乎已经快要走完它的历史道路，在庞大的社会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生产行为、经济生活的某些新因素，已经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动荡、流变。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在这种“人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晚明思想家王畿、王艮、李贽、焦竑、何心隐等才提出了广泛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圣贤偶像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理学蒙昧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和顺应发展人的自然本性。尽管晚明社会思潮并不像某些论者所强调的那样等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质的规定性，没有形成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的思想体系，而且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快夭折。但是，这一思潮无疑是中国民族在中世纪黑暗中的一度觉醒，而且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异于往古的思想文化运动。

在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下，晚明蓬勃兴起了一个文学新潮流，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凌濛初，包括稍早一些的李梦阳、徐渭及《西游记》作者等人因此也成为晚明思想文化运动的弄潮儿。《金瓶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晚明文学新潮其他作品在基本精神上有着一致性，而且，由于其长篇小说的体裁形式，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现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当然地成为这一文学新潮的重要代表作之一。）